

中國社會歷史評論

第十六卷(上)
二零一五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Chinese Social History Review

第十六卷·二零一五

上卷

常建华 主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第16卷 / 常建华主编. —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528-0352-5

I. ①中… II. ①常… III. ①史评—中国 IV.
①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1466号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第十六卷)

常建华/主编

出版人/张玮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30.25 字数 693 千字
2015 年 11 月 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8-0352-5 定价：100.00 元

编辑委员会 (以汉语拼音为序)

顾问

冯尔康 刘泽华

委员

常建华 杜家骥 江沛 李金铮 李治安 刘毅
王利华 王力平 王先明 许檀 阎爱民 余新忠
张分田 张国刚 张荣明 张思 朱凤瀚 朱彦民

编辑部

夏炎 张传勇

主编

常建华

目 录

【佛教与社会】

- 论安史之乱和会昌灭佛对唐幽州佛教的影响
——以《大唐云居寺故寺主律大德神道碑铭并序》为中心 尤 李(1)
唐代福建佛教的几点观察
——刘軻《福州东山圣泉法华院记》佚文释证 陈文庆(22)
民国佛教的医药慈善研究 明成满(37)

【日常生活与社会空间】

- 神人共享:一个闽北村落庙宇的历史变迁及其权力意涵 李 军(51)
戏院还是戏园
——清末民初北京传统娱乐空间的更新 张 忠(77)
漫步、出游与旅行:日常生活中的空间位移
——以民国时期上海知识群体为例(1927—1937) 胡悦晗(88)

【医疗社会史】

- 一产多子:社会与医疗视野下的多胞胎诠释
——以明代历史为中心 刘 佳(106)
清代医家对治疗决定权的争夺 张田生(129)

【社会变迁与政治】

- 清末“江宁兴学”研究 都 楠 王卫平(140)
拯救与抵制
——20世纪30年代的杭州废娼与社会反应 罗衍军 刘 平(158)
水利纠纷有解,抑或无解?
——“水政治”视野下新丰坝水利纠纷的历史考察 欧七斤 张爱华(170)
小故事与大历史:费宫人故事流传演变探析 李旭东(186)
元朝境内的金银流通 刘明罡(206)

【书评】

- 从印度到中国,从菩萨到母亲
——评于君方《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 王大伟(215)

“新法律史”这般发生

——评尤陈俊著《法律知识的文字传播——明清日用类书与社会日常生活》	赵 晶(218)
读陈宝良著《中国妇女通史·明代卷》	阚玮玥(226)
编后语	(230)
英文摘要	(231)

CONTENTS

【Buddhism and Society】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i>An Lushan's rebellion and Huichang Suppression</i> on Buddhism in Youzhou(幽州)in the Tang:Focus on <i>Zhenxing</i> (真性)Monk's Inscription in Yunju(云居) Temple	You Li(1)
Some Observations of Fujian Buddhist in Tang Dynasty: <i>a study of Liu Ke's "the Tablet Inscription of Fuzhou FaHua temple"</i>	Chen Wenqing(22)
The Research about Medical Charity of Buddhism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ing Chengman(37)

【Daily Life and Social Space】

Deities and Man Enjoy Together:The Historical Transition and Power Connotation of a Village Temple in Northern Fujian	Li Jun(51)
Theater or Hsi Yuan:the Updating of Beijing Traditional Entertainment Spa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Zhong(77)
Walk,Excursion and Long Journey:Spatial Displacement in Everyday-life—Take Republican Shanghai Intellectuals as an Example(1927–1937)	Hu Yuehan(88)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Multifetation:The Explanation of Multiple Bir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ety and Medicine	Liu Jia(106)
Doctors' Struggle for Medical Decision in Qing Dynasty	Zhang Tiansheng(129)

【Social Changes and Politics】

"The Establishment of School Education in Jiangn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Du Yue Wang Weiping(140)
Save and Resist:The Abolition of Prostitutes in Hangzhou and its Social Response in the 1930's	Luo Yanjun Liu Ping(158)
Have Struggles for Water Results or no Results:a Historical Review on Struggles for Xin-feng Da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olitics of Water	Ou Qijin Zhang Aihua(170)
Little Story in Great History:an Analysis on the Diffusion and Evolution of FEIGONGREN'S Story	Li Xudong(186)
Gold and Silver's Circulation of the Yuan Dynasty in China	Liu Minggang(206)

【Book Review】

- Kuan-Yin, To be Bodhisattva and Mother, From India to China: Professer Chun-Fang Yu's
Kuan-Yi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valokitesvara Wang Dawei(215)
- "The New History" is Happening: *The Review on The Literal Dissemination of Legal Knowledge: Encyclopedias for Daily Use and Social Life in Ming-Qing China* by Chenjun You
..... Zhao Jing(218)
- Book Review o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Women in the Ming Dynasty* by Baoliang Chen Kan Weiyue(226)
- From the Editor (230)
- summary of Articles (231)

【佛教与社会】

论安史之乱和会昌灭佛对唐幽州佛教的影响

——以《大唐云居寺故寺主律大德神道碑铭并序》为中心

尤 李

【摘要】本文通过考察《大唐云居寺故寺主律大德神道碑铭并序》(简称《真性大德神道碑》),拓展分析了安史之乱和会昌法难对唐幽州佛教的影响,揭示出中晚唐幽州—卢龙镇佛教之特性。幽州地区律宗繁盛,出现了学问修行都很高的代表人物真性大德。安史之乱对北方佛教造成巨大冲击,但幽州的经济条件仍然十分优越,云居寺在战乱后仍很兴盛,得到众多富裕施主的供养。这为精深佛学研究的持续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中晚唐以降,朝廷屡次下诏禁止私度僧尼。但幽州节度使却毫无顾忌地在自己的辖区内邀请高僧开设戒坛度僧。这与安史之乱后,幽州—卢龙镇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俨然成为“独立王国”密切相关。幽州与唐廷在政治上的隔阂和争斗并不影响幽州与长安在佛教文化方面的互动。在会昌毁佛期间,幽州地区受自然条件、手工业门类限制,佛教功德事业受到影响,与河东地区的佛教文化交流暂时受阻。

【关键词】幽州;云居寺;佛教;安史之乱;会昌灭佛

“安史之乱”和“会昌毁法”是讨论中晚唐幽州地区的佛教与社会时不容回避的两个重大事件。以往学界对这两大事件给整个唐朝的佛学研究、佛教的破坏和冲击讨论颇多,但是迄今似无专文探究它们对幽州佛教的影响。

《大唐云居寺故寺主律大德神道碑铭并序》详细记录了中唐时期活跃在幽州良乡县(今北京房山区)云居寺的一位高僧——真性大德的生平。这方典型的神道碑背后牵动的问题甚多,能延伸讨论安史之乱和会昌灭佛对幽州佛教的影响。现将《大唐云居寺故寺主律大德神道碑铭并序》(下文简称《真性大德神道碑》)录文并标点如下,以备分析讨论。“《[大]唐云居寺故寺主律大德神道碑铭并序》,瀘江栖夷子何筹撰,前卢龙节度驱使官张景琮书并篆额”。碑文曰:

昔者金人教演西方,化流东土。神功莫测,妙用难穷。日月不能拟其明,圣贤无以究其奥。历河沙之世界,论亿劫之修行。既立三乘,又开不二。执之则纤毫有别,契之则丝发无差。共证菩提,俱登解脱。巍巍荡荡,无得而称。末代宗徒,随性而入。

大德讳真性,俗姓史氏,涿郡范阳人也。爰祖及父,晦迹夷名,嘉遁林泉,勤业皋垄。大德逸步孤立,介然而贞。性自天钟,议非师得。观色身之假立,潜趣真宗;知至道

之可求，精修梵行。既端清而秉志，乃受具以依年。薰然律风，辉振前古。万行由兹浸起，六事于是齐修。坚刚迥持，清净靡杂。狂风虽振，宁摇赤箭之茎；欲浪徒翻，不着青莲之色。割烦恼之系，」利蕴荆钟；断贪爱之缘，铠含切玉。而乃听读忘倦，慈忍兼习。操持勇猛，佩服精进。非唯二百五十净戒，洞达玄关；抑以八万四千法」门，游泳真际。则知鸿鹄飞翔，必造云霄之上；龙象跃，宁留沼沚之间？繇是四远向从，一方瞻敬。高行善节，时为美谈。

顷者，合寺耆年至」于初学，同诚壹志，请采寺纲。大德固执搃谦，抑而不许。乃曰：“云山异境，禅律杂居。若非通明，何以悦众？”」大德曰：“顾无捷连统众之术，且乏末田乞地之功。凡练纪纲，必资德业。非安于己，不利于人。”寺众愈坚其辞，志不可夺，乃唱言曰：“佛刹」戒严，固难条贯。考详视履，非上德而谁？师之不从，吾将安附！”三请而后许之。四众欣然，合寺相贺。

大德至性平等，慧用圆明。规绳既」陈，高卑自序。奉精勤以敬，策堕慢以严。共乐推诚，咸称悦服。遂使施财者松门继踵，齋供者溪路相望。佛宇益崇，常住滋赡。是知道行」高而归依云赴，福德具而感应响从。又以巾锡之余，床榻之外，曾于本院别起道场。请高行数人转藏经七遍。大德宿植精进，」专至饶益。襦寒饭餒，每损节其衣盂；拯溺持癫痫，宁顾蹈其水火。殊踪异行，难可思量。寒暑屡移，始终一贯。

元和中，廉察使相国彭城」刘公慕其高节，亟请临坛。手字叠飞，使车交织。大德以情田不产，鉴用忘机。久处山林，已遂平生之志。那能师证，更登名利之场？徒」观马胜之威仪，谁识罗侯之密行？恩写牢让，持坚不回。暨大和有九祀，方伯司徒史公之领戎也，常目重山，聆风仰德。乃曰：“昔三藏」传经于天竺，六祖弘化于曹溪。方知涿鹿名区，时有异人间出。佛法渐远，吾宗继明。益倾南望之诚，兼陈北巷之敬。”奇香异药，上服名」衣，使命往来，难可称计。以其年季秋下旬有三日，示疾，归寂于本寺东院。俗年八十四，法岁六十五。猿马悲鸣，松筠改色。凄凉士」庶，喟悼元戎。于戏！火宅方然，羊车脱辐。师之已矣，人何归依！

大德学行该通，威德端肃。所依上足，皆是名人。难具升堂，聊书入」室曰仲说、恒智、鉴直、惠增、志千、文展、宝定等七人焉。惟增也早岁辞乡，游京就学。曾于荐福寺讲《大花严经》，声振洪都，艺交清级。众」称开士，时谓入流。细行密用，难具详纪。直与千业擅小乘，学游多地。尽得南山之要，皆扬东塔之能。彼四人者，精通秘奥，博达多闻。虎步莲」宫，鸾翔梵苑。感师之教，报师之恩。焚棺于碧岫之阳，起塔于清流之左。虽朝昏展敬，未尽所诚。更议刊乎贞珉，纪其盛德。良工方购，朴而」未形。俄属先朝大兴沙汰，寺皆毁废，僧遁林岩。洎佛日重明，屡更星岁。七人之内，唯宝定存焉。其诚则深，其力不置。有说公门」人前寺主僧弘信，即释门之孙也。戒律清肃，义心坚勇。悲本师之早歿，宿志未陈。与定公之相扶，再议崇立。访余以至，感而直书。冀」巡礼往来，披文知行。铭曰：」

圆觉真乘，多不能造。吾师正性，尽入其奥。操持净行，契叶流教。意马忘奔，心猿不踔。戒月圆满，律风清凉。白璧无点，明珠有光。」利根精进，密行包藏。破暗灯炬，济难舟航。宰寺开经，施财供食。但益勤励，曾无退息。时遵其义，众悦其德。不可思议，多所饶益。」法性无灭，色身有移。悲缠上足，追慕先师。既崇灵塔，又立丰碑。遗风余

烈，千古长垂。」

咸通八年丁亥岁十一月四日建。^①

一 真性大德的律行和中晚唐幽州地区的律宗

书写《真性大德神道碑》并篆书碑额的是“前卢龙节度驱使官张景琮”。严耕望先生勾稽文献和石刻材料中驱使官的记录，认为：在安史乱前节度使府中已有驱使之职，但具体职掌不详^②。因此，《真性大德神道碑》的书写者张景琮属于幽州—卢龙节度使府的僚佐。此碑于唐懿宗咸通八年（867年）刻成，时任幽州节度使为张允伸^③。既然张景琮系“前卢龙节度驱使官”，那么，他很可能是张允伸的前任张仲武、张直方或周隸使府中的僚佐^④。

据碑文所述，真性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去世，“俗年八十四，法岁六十五”。照此推断，他当生于唐玄宗天宝十一载（752年），在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受具足戒，经历了安史之乱。

真性大德在云居寺和整个幽州地区都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律僧。《真性大德神道碑》称他“薰然律风，辉振前古。万行由兹浸起，六事于是齐修”。“六事”即菩萨欲成就六度之行所修之六事，即“六波罗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真性自身修行颇高，成为释门龙象、法界栋梁，所以“四远向从，一方瞻敬。高行善节，时为美谈”。

真性还擅长禅法。按《真性大德神道碑》所记，众僧请真性担任云居寺住持，称“云山异境，禅律杂居。若非通明，何以悦众”？此段文字暗示当时的云居寺兼行禅宗和律宗，真性为禅律皆通之高僧。在这样的情形下，众僧极力主张有才德而威望高的真性来主持大局。真性成为住持后，“四众欣然，合寺相贺”，即获得僧俗界信徒的广泛认可。

^① 录文根据1.《大唐云居寺故寺主律大德神道碑拓片》，云居寺文物管理处编：《云居寺贞石录》，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页；2.（清）董浩等编：《全唐文》卷七五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856—7857页；3.北京图书馆金石组、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石经组编：《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第1部分《碑和题记（唐至民国）》，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页。“〔〕”表示碑文提行处。

^② 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收入严耕望著《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版，第205—206页。

^③ 张允伸于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至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年）任幽州节度使（郁贤皓著：《唐刺史考全编》卷一一六《幽州（范阳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3页）。

^④ 张仲武于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至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任幽州节度使；张直方于唐宣宗大中三年任幽州节度使；周隸于唐宣宗大中三年至大中四年任幽州节度使（《唐刺史考全编》卷一一六《幽州（范阳郡）》，第1612—1613页）。

据敦煌文书 S.529 背面《诸山圣迹志》^①所载，在后唐时期，一名云游僧人从盘山到幽州城，又“南行百余里至石经寺，大藏经文并镌石上。云轩皇龛月殿，迥若天宫。律门洋洋，禅流济济”^②。石经寺即云居寺。可见直到后唐时代，云居寺仍然禅律相间。

在佛教宗派中，最深刻、最富于理论色彩的当推法相宗和华严宗^③。自 8 世纪中叶以后，士人越来越相信，真正的佛教信仰不在经典的阅读和研习中，而应在习禅与持律中^④。八九世纪之间的佛教文献中，似乎佛教的理论兴趣突然丧失，人们似乎更愿意接受律师、禅师们的实践性修行方式和解脱途径，修行中禅律并重^⑤。因此，在这一时代，幽州云居寺禅律并行，与中晚唐全国的佛教发展轨迹一致。

在唐前期，道宣创立律宗（称“南山宗”）之后不久，怀素又创立新章（称“东塔宗”），分别形成旧疏与新疏^⑥。律宗一直存在新、旧二疏之争，经过唐代宗朝的争论和判定，到唐德宗即位，皇帝下诏新、旧两疏并行^⑦。在长安如此，在幽州云居寺，似乎也是新、旧二疏兼容。如《真性大德神道碑》说真性的弟子鉴直与志千“业擅小乘，学游多地。尽得南山之要，皆扬东塔之能”。

按房山云居寺《山顶石浮图后记》所述，开元二十八年（740 年），唐玄宗接受金仙公主的建议，将开元藏经送到幽州良乡县云居寺。负责送经的就有“京崇福寺沙门智升，检校送经临坛大德沙门秀璋”等^⑧。陈金华先生将秀璋比定为《宋高僧传》中的秀章^⑨。倘若这一推论成立，从东塔律师怀素临终前对秀章说“余律行多缺，一报将终”^⑩来看，秀章很可能也是一位东塔宗的律僧。徐文明先生就此认定秀章肯定是怀素的亲传弟子^⑪。徐先生提出怀素为东

① 图录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第 2 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1—13 页；录文见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 3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5—77 页。S.529 背面文献，向达先生拟题《失名行记》（《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收入向达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200 页），王重民先生拟题《诸山圣迹志》（《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斯坦因劫经录》，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20 页）。郑炳林先生根据五代十国的政治形势、各地地名、行政建置的变化，断定《诸山圣迹志》反映的是后唐庄宗至明宗十余年的情况（见《论〈诸山圣迹志〉的成书年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 年第 1 期，第 143—150 页）。徐俊先生认为：《诸山圣迹志》中诸诗并非游历诸山圣迹的僧人所创作，而是他就游历所及抄录前人作品（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卷下，北京：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491—493 页）。无论《诸山圣迹志》中的诗歌是游历圣迹的僧人自己创作，还是抄录前人作品，终究还是对所见所闻的记录，其内容仍大致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本文主旨只涉及其中记录的幽州地区的情况，对此问题不再纠缠。

② 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 3 卷，第 50 页。

③ 葛兆光：《理论兴趣的衰退——八至十世纪中国佛教的转型之一》，《世界宗教研究》2001 年第 1 期，第 38—39 页。

④ 葛兆光：《理论兴趣的衰退——八至十世纪中国佛教的转型之一》，第 35—36 页。

⑤ 葛兆光：《理论兴趣的衰退——八至十世纪中国佛教的转型之一》，第 44 页。

⑥ 汤用彤：《隋唐之宗派》，汤用彤著：《隋唐佛教史稿》第 4 章，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74—186 页。

⑦ 具体情况见（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一五《唐京师安国寺如净传》、《唐京师西明寺圆照传》，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365—366、376—379 页；唐代宗《答天长寺沙门昙邃等表定新旧两疏诏》，《全唐文》卷四八，第 526 页。

⑧ 《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第 1 部分《碑和题记（唐至民国）》，第 11—12 页。

⑨ Jinhua Chen, “A Daoist Princess and a Buddhist Temple: a New Theory on the Causes of the Canon-delivering Mission Originally Proposed by Princess Jinxian (689–732) in 730”,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69, Part 2, 2006, p.269.

⑩ 《宋高僧传》卷五《唐京师恒济寺怀素传》，第 335 页。

⑪ 徐文明：《东塔宗的传承与流布》，《戒幢佛学》第 2 卷，2002 年，第 470 页。

塔宗的创始人,传弟子思恒、秀章,且智升可能是秀章的弟子^①。照此推断,智升和秀章都曾经前往云居寺送经,他们可能同时也将东塔宗学说传播到幽州地区。

《宋高僧传》之《明律篇》收录的高僧多为南方人,而且出生于南方贵族家庭^②。徐文明和陈怀宇先生认为:律宗始祖道宣的家世系南方贵族,正是他将南方的佛学传统带入律宗^③。其实,在北方地区,佛教色彩浓厚的幽州也建有不少律寺。在唐前期,幽州地区亦有习“南山律”之高僧。如“燕代高僧”向南山宗的玄俨学习^④。从安史之乱后,直到晚唐,幽州的律宗仍然负有盛名。除了云居寺的律大德真性,还有来自江都禅智寺的释从审在唐懿宗咸通五年(864年)“受具戒于燕台奉福寺律席经筵,遍知尝染,后并三衣成五纳”^⑤。从审从遥远的江南地区云游至河北北部的幽州受具足戒,足见幽州律宗之声名。

除云居寺外,幽州城内著名的悯忠寺也是一座大型律寺。在晚唐五代时期,有一些高僧在此活动。如“释可止,姓马氏,范阳大房山高丘人也。年甫十二,迥有出俗之心,依悯忠寺法贞律师”^⑥。“释僧照,姓张氏,范阳人也。年十四出家,投悯忠寺”^⑦。“释师律,范阳人也,姓贾氏,大丞相魏国公耽之后,《唐书》有传。律弱毗端谨,不与群童斗伎。裁(才)十五岁,于悯中(忠)寺落发,礼贞涉为师”^⑧。另外,幽州的宝刹寺亦有律僧。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年)四月八日,房山石经《佛说七俱胝(胝)佛大心准提陀罗尼经》^⑨额题有幽州“云居寺大德僧真性,宝刹寺大德僧玄素,宝刹寺律座主僧惟简”^⑩。

直至辽朝,幽州地域的律宗仍然繁盛。辽南京(即唐幽州城)建有许多大型律寺,其规模令人咋舌。金初出使的宋朝使者洪皓写道:“燕京兰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禅,曰太平、招提、竹林、瑞像。”^⑪

二 中晚唐幽州佛教发展的物质条件

安史之乱迫使唐代的宗教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寺院作为贵族化经院佛学的依托,一旦

^① 徐文明:《东塔宗的传承与流布》,第469—475页。

^② 《宋高僧传》卷一四至一六,第327—410页。

^③ 徐文明:《东塔宗的传承与流布》,第470—471页;Chen Huaiyu, “Buddhism in South China as a Cultural Imaginaire”, *The Revival of Buddhist Monasticism in Medieval China*,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2007, pp.13—56.

^④ 《宋高僧传》卷一四《唐越州法华山寺玄俨传》,第342—343页。

^⑤ 《宋高僧传》卷二五《梁扬州禅智寺从审传》,第640页。

^⑥ 《宋高僧传》卷七《后唐洛京长寿寺可止传》,第148—150页。

^⑦ 《宋高僧传》卷七《汉洛京法林院僧照传》,第153—154页。

^⑧ 《宋高僧传》卷二八《大宋东京开宝寺师律传》,第710页。

^⑨ 《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云:“《七俱胝佛母大准提陀罗尼经》一卷”,“大唐垂拱元年(685年),地婆诃罗于西京太原寺译”。(明伦等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一,[日]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第55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8年版,第379页。)《开元释教录》曰:“《七俱胝佛大心准提陀罗尼经》一卷”,小注云:“初出与金刚智出者同本,见《大周录》,垂拱元年于西太原寺归宁院译。”(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九,《大正藏》第55册,第563页。)

^⑩ 《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第3部分《诸经题记(唐)》,第233页。

^⑪ (宋)洪皓:《松漠记闻》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页。

在战争中衰败,佛教的经院学术与理论研究就失去了条件^①。在叛乱之后,依托于大寺院、需要大家族供养的、依靠译经、讲经、论辩、造疏维持的佛教理论兴趣逐渐衰退,精深的佛学研究成为一种“奢侈”,崇尚义学的风气渐渐消解^②。

法藏敦煌文书 P.3608 背面、P.3620 《讽谏今上破鲜于叔明令狐垣等请试僧尼及不许交易书》载:在安史之乱后,“天下寺舍,翻作军营;所在伽蓝,例无僧饭”^③。宝应元年(762 年)八月,唐代宗颁布诏令:“如闻州县公私,多借寺观居止,因兹亵渎,切宜禁断,务令清肃。”^④唐宣宗大中二年(848 年)敕曰:“如闻天下寺观,多被军士及官吏诸客居止。狎而黩之,曾不畏忌,缁黄屏窜,堂居毁撤,寝处于象设之门,庖厨于廊庑之下。缅然遐想,愧叹良深。自今已后,切宜禁断。其军士,委州县长吏与本将商量,移于稳便处安置。其官吏诸客等,频有处分,自合遵承。仰敕到当时遣。”^⑤安史之乱的主战场在北方,所以寺观被破坏应该主要指北方地区的情况。直到宣宗时期,离叛乱已经 90 余年,战争中遭受破坏的寺观却仍然没有得到恢复。在这样的环境下,安静地沉下心来进行精深的佛学研究肯定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奢侈”。

在唐文宗、武宗时代,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在通往五台山巡礼之路上,亲眼目睹今山东半岛上的好些寺院面临窘境。开成五年(840 年)二月二十七日,圆仁到达登州牟平县(今山东烟台东旧牟平县)的庐山寺,“未时,入寺宿。只有三纲、典座、直岁五人,更无僧人。佛殿破坏。僧房皆安置俗人,变为俗家”^⑥。三月,圆仁抵达登州(今山东蓬莱、龙口),“入开元寺宿。……开元寺僧房稍多,尽安置官客,无闲房。有僧人来,无处安置”^⑦。连登州的官寺开元寺都将僧房尽用于安置官客,让僧人无法留宿。三月十五日,圆仁行至莱州(今山东掖县),“出城外东南龙兴寺宿。佛殿前有十三级砖塔。基阶颓坏,周廊破落。寺无众僧,仅有二僧。寺主典座,心性平庸,不知主客之礼”^⑧。第二天“早朝,常住供吃粥。寺家无饭,各自求食”^⑨。龙兴寺亦为官寺,却依然衰落了。这座寺庙不但经济条件恶劣,僧人的修养和学问都令人不敢恭维。三月十九日,圆仁至青州北海县(今山东潍坊)观法寺留宿,见“佛殿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寺中十二来僧尽在俗家,寺内有典座僧一人”^⑩。四月六日,圆仁抵达长白山(今山东邹平县附近)中著名的醴泉寺,见“寺舍破落,不多净喫。圣迹陵夷,无人修治。寺庄园十五所,于今不少。僧途本有百来僧,如今随缘散去。现住寺者,三十向上也”^⑪。所谓原来的僧人“随缘

① 孙昌武:《唐长安佛寺考》,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 2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1 页。

② 葛兆光:《理论兴趣的衰退——八至十世纪中国佛教的转型之一》,第 35—47 页。

③ 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 129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6 年版,第 258、320 页;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卷五四,北京: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651 页。

④ 《条贯僧尼敕》,(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590 页。又见于《全唐文》卷四六,第 508 页。

⑤ 常袞:《禁天下寺观停客制》,《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第 590 页。

⑥ [日]圆仁著,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校注,周一良审阅:《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二,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13 页。

⑦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二,第 217 页。

⑧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二,第 232 页。

⑨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二,第 233 页。

⑩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二,第 234 页。

⑪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二,第 246 页。

散去”,当指经过安史之乱的打击,本寺衰落,僧人到别处去谋生。圆仁的亲身经历充分证明:自安禄山叛乱后,将近百年,今山东半岛上的好些寺院仍然没有恢复生气和昔日的景象。

在成德镇境内,情况也差不多。开成五年(840年)四月十七日,圆仁行至冀州堂阳县(今河北新河县附近),“入城内觉观寺宿。寺舍破落,无有僧徒,只有知寺僧一人,见客不殷勤。房床铺设,总不勾当”^①。四月十八日,圆仁“到赵州界宁晋县(今河北宁晋县)东唐城寺宿。寺极贫疏,僧心庸贱”^②。四月十九日,圆仁“到赵州(今河北赵县)南开元寺宿。屋舍破落,佛像尊严。师僧心鄙,怕见客僧”^③。连官方的开元寺都尚且如此。四月二十二日,圆仁“到镇州界行唐县(今河北行唐县),入城内西禅院宿。有廿余禅僧,心极闹乱”^④。这些禅僧在“心极闹乱”的情况下,必然无法静心修行。

河北地区众多寺院凋零,主要因为这是安史之乱的主战场。在这样的条件下,自然没有学问僧潜心钻研佛学。相形之下,幽州良乡县的云居寺还出现学问和修行均非常出众的高僧真性。这跟叛乱之后,幽州地区良好的物质条件是分不开的。

唐代幽州城乃河北北部的军事重镇、经济文化中心。从安史之乱后,直到晚唐,河北地区仍然具有雄厚的物质和军事基础。正如杜牧所说:“夫河北者,俗俭风浑,淫巧不生,朴毅坚强,果于战耕。……加以土息健马,便于驰敌,是以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亦犹大农之家,不待珠玑,然后以为富也。天下无河北则不可,河北既虏,则精甲、锐卒、利刀、良弓、健马无有也。”^⑤据《太平广记》所载,在张直方生活的时代(约唐武宗至僖宗时期^⑥),燕地“地沃兵庶,朝廷每姑息之”^⑦。虽然《广记》系小说,但它所依托和描述的社会背景应当是真实的。

在唐末五代之际,刘仁恭之子刘守光据有幽州一卢龙镇之后,欲称帝。他认为可以凭借的经济资本之一就是他所自诩的“我大燕地方二千里……东有鱼盐之饶,北有塞马之利”^⑧。可见即便在安禄山叛乱之后,幽州地区的经济条件还是非常优越。

按敦煌文书S.529背面《诸山圣迹志》所记,在后唐时期,一无名僧人游历到河北地区,这样叙述当地的情况:“大凡河北道六节廿四州,南北二千里,东[西]一千里,北是外界,屡犯他(?)骑,西背崇山,东临海溟。桑麻映日,柳槐交阴,原野膏腴,关隘好邑。”^⑨这名僧人游历至幽州,这样描述幽州城:“南行三百里至幽州,管九州七县,[城]周围五十里。……封疆沃壤,平广膏腴,地产绫罗,偏丰梨栗。”^⑩依其所述,在晚唐五代战乱时期,幽州地区仍然十分富庶。这也为幽州佛教持续繁荣提供了重要基础。

①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二,第253页。

②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二,第254页。

③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二,第254页。

④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二,第257页。

⑤ 杜牧:《樊川文集》卷五《战论》,吴在庆撰:《杜牧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49页。

⑥ 《旧唐书》卷一八〇《张仲武传·附子直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679页。

⑦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四五五《张直方》,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713页。

⑧ 《旧五代史》卷一三五《刘守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804页。

⑨ 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3卷,第45页。

⑩ 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3卷,第49—50页。

《真性大德神道碑》叙述真性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管理才干赢得广大信徒的尊重,因而吸引大量信徒前来布施、做功德。结果,云居寺“佛宇益崇”“常住滋赡”。其中“常住”系佛教僧众不可分割之共同财产,泛指所有布施于佛教的财产。而且,从唐德宗贞元至唐宪宗元和年间,真性还得到幽州地方势力,特别是幽州节度使刘济的施助,刊刻了许多石经^①。显然,在安史之乱后,云居寺仍然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资助。这些都是精深的佛学研究得以延续的必要条件。

三 戒坛与度牒

《真性大德神道碑》还隐隐约约透露出一些有关唐后期国家的度牒政策及其施行状况的关键信息。

《真性大德神道碑》讲述真性不断受到幽州节度使的礼遇:“元和中,廉察使相国彭城刘公慕其高节,亟请临坛。手字叠飞,使车交织。”刘济在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年)至唐宪宗元和五年(810年)任幽州卢龙节度使^②。唐宪宗元和五年七月乙卯,“幽州节度使刘济为其子总鸩死”^③。而刘总又在唐宪宗元和五年至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任幽州卢龙节度使^④。目前还无法判断碑文中的“廉察使相国彭城刘公”是指刘济还是刘总。尽管幽帅热忱相邀,可真性认为接受节度使的邀请去开设戒坛,即是登“名利之场”。

值得关注的是:实际上,唐宪宗在即位之初就已经颁布诏敕,禁止设坛私度僧尼。这从李德裕的上奏可以证明。唐敬宗即位之后,长庆四年(824年)十二月下旬,李德裕上《王智兴度僧尼状》曰:

王智兴于所属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淮水西岸)置僧尼戒坛。自去冬于江、淮以南,所在悬榜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807年)后,不敢私度。闻泗州有坛,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以来,落发者无虑数万。臣今于蒜山渡点其过者,一旦百余入,勘问,惟十四人是旧人沙弥,余是苏、常百姓,亦无本州文榜,寻已勒还本贯。访闻泗州置坛次第,凡髡夫到,人纳二千,给牒即回,别无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诞节,计江、淮以南,失却六十万丁壮。此事非细,系于朝廷法度。^⑤

李德裕的“江、淮自元和二年后,不敢私度”之语,暗示宪宗至少在元和二年已经颁布禁止私度之诏敕。

^① 中国佛教协会:《〈房山云居寺石经〉前言》,吕铁钢主编、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编:《房山石经研究》第1册,香港: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9页。

^② 《唐刺史考全编》卷一一六《幽州(范阳郡)》,第1608—1609页。

^③ 《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第431页。

^④ 《唐刺史考全编》卷一一六《幽州(范阳郡)》,第1609页。

^⑤ (唐)李德裕著,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别集》卷五,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16—517页。又见于《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第4514页。这两个版本用词略有不同。

在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入唐巡礼的日本僧人圆仁称:“大唐太和二年以来,为诸州多有密与授戒,下符诸州,不许百姓剃发为僧。唯有五台山戒坛一处,洛阳终山琉璃坛一处。自此二外,皆悉禁断。”^①日本的小野胜年先生已经根据《旧唐书·李德裕传》所载“江、淮自元和二年后,不敢私度”,判定圆仁所记“太和二年”可能系“元和二年”之误^②。白化文先生根据《嵩山会善寺戒坛记》之文,认为“洛阳终山琉璃坛”的“终山”乃“嵩山”之误,应该指唐高僧一行所创立的“嵩山会善寺琉璃坛”^③。总之,自元和二年之后,朝廷承认的戒坛仅有五台山和嵩山两处。但圆仁却说“诸州多有密与授戒”,说明禁令执行不严。

唐敬宗刚即位,“徐州节度使王智兴聚货无厌,以敬宗诞月,请于泗州置僧坛,度人资福,以邀厚利”^④。起初,皇帝“诏可”^⑤。结果,“江、淮之民,皆群党渡淮”。李德裕上奏皇帝,直陈其弊端,皇帝“即日诏徐州罢之”^⑥。如上文所引《王智兴度僧尼状》,李德裕阻止王智兴滥度僧尼,主要是担心有人借此“规避王徭,影庇资产”,江、淮以南会失去“六十万丁壮”。这无疑会对唐朝的经济命脉产生重大影响。对此问题,下文将进一步分析。我们先看幽州一卢龙镇的情况。

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在朝廷讨伐成德镇王承宗之时,刘济、刘总父子曾率领幽州镇兵助战^⑦。元和五年七月,朝廷与成德镇的战争陷入僵局,“时招讨非其人,诸军解体,而藩邻观望养寇,空为逗挠,以弊国赋。而李师道、刘济亟请昭雪,乃归罪卢从史而宥承宗,(唐宪宗)不得已而行之也”^⑧。卢从史时任昭义节度使,并在朝廷与叛臣王承宗之间首鼠两端^⑨。在宪宗朝,幽州镇与朝廷保持和睦。在唐廷平定藩镇的战争中,尤其是讨伐成德镇王承宗的重大军事行动中,幽州镇属于朝廷笼络和拉拢的对象^⑩。宪宗十分看重幽州镇对王承宗的牵制力。由于形势所迫,对刘济所提的不合规矩的要求,中央政府尚且姑息而从之。照此推之,对幽州节度使(无论是刘济,还是刘总)违反诏敕、置戒坛度僧尼之事,朝廷更不会过问和处罚。刘济或刘总对这些利害关系可能早就算好了。如果真性接受刘济或刘总的邀请,开坛度僧,宪宗就算知道,为了战争之大局,也会佯装不知。

在唐宣宗朝,幽州节度使张允伸还两次公开开设戒坛。按《魏州故禅大德奖公塔碑》所记,奖公在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伏遇卢龙军节度使张公奏致(置)坛场。和尚是时,戒相方具。而后大中九年,再遇侍中张公重起戒坛于涿郡。众请和尚以六逾星纪三统讲筵,宣

①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一,第54页。

② [日]小野勝年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記の研究》第一卷,東京:鈴木學術財團1964年版,第242—245頁。

③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一,第55页。

④ 《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第4514页。

⑤ 《新唐书》卷一八〇《李德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29页。

⑥ 《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第4514页。

⑦ 权德舆:《唐故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押奚契丹两番经略卢龙军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幽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彭城郡王赠太师刘公墓志铭并序》,(唐)权德舆撰,郭广伟校点:《权德舆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19—320页。

⑧ 《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第431页。

⑨ 《旧唐书》卷一三二《卢从史传》,第3652—3653页。

⑩ 《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卷一五《宪宗纪》下,第411—472页。